

文艺批判文章选辑

*

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广州光孝路17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记证粤版字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10111·681

书号：2289·787×1092 毫米 1/32·10 $\frac{7}{8}$ 印张·207,000字

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100 定价：(5)七 角

关于艺术創作問題討論的概述

一年多来，在我国文学艺术界中有一场頗为热烈的学术討論。这场討論是从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新建設》上发表了周谷城的《艺术創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以后展开的。周谷城在这篇文章中对艺术創作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文章的观点引起了艺术理論、美学以至哲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許多人反对周谷城在《艺术創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的观点，并就周谷城近几年所写的有关文章中的一些看法展开討論。几乎在每篇重要批評文章发表以后，周谷城都写了答辯、反駁文章，坚持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场涉及文艺理論問題的重大討論。文艺工作者应当关心它，因为文艺工作者应当懂得一点文艺理論，否則会迷失方向。其它工作崗位上的同志們，也应当尽可能地理解一点这个問題，以利于开闊視界，提高认識。为了帮助讀者了解这场討論的內容，現将討論中所爭論的主要問題及主要論点簡略介紹于下，以供参考：

一、“无差別的境界”問題

周谷城认为“为着要說明創作，最宜把創作之前的情况

先考查考查。……創作之前的情况是怎样的？……曰：生活上无差別的境界是也……生活上的問題是一个又一个的来，矛盾是一次又一次的来。但来了，就逼着我們去解决；問題或矛盾解决了，生活上必有无差別的境界出現”。“无差別的境界，就是沒有矛盾的境界。”“平常我們所謂主观与客观，在这里竟是沒有區別的”，这种境界“从正面說又叫絕對境界”。他說：“艺术生活是超越差別，进入絕對的”。

許多批評者反駁他这个看法。茹行說：“在社会生活过程中沒有矛盾的无差別境界是永远不会出現的。”周谷城肯定“无差別的境界”的存在，就否认了矛盾的普遍性。把艺术当成对于“无差別的境界”追求的手段，“会使艺术失去它所應該負起的崇高的社会作用”。王子野、朱光潛等人指出：旧矛盾解决了，又有新矛盾，中間沒有无矛盾、无差別的境界。如果承认了事物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沒有矛盾的阶段，“那么，下一步发展究竟从哪里得到推动力或原因呢？”許多文章认为周谷城从“无差別的境界”推演出的“断而相續”說是站不住脚的。李醒尘进一步指出：“所謂‘无差别的境界’和有差别的境界都是周先生虛构的主观的精神境界”。周先生用主观精神頂替了客观現實，終于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論和历史唯心論，由此完全否定了客观現實中的矛盾斗争，尤其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二、艺术的源泉

周谷城說：“美的源泉只能从斗争中来。沒有斗争，便沒

有成敗可言；沒有成敗可言，感情或情感便不会发生；情感不发生，美的来源一定枯竭。……美或艺术或艺术品，却是以情感为其源泉的”。他还說：“我們只能說，生活上感人最深的一段，所产生的情感，被艺术家捉住，使之成体，附以形象，以便独立感人。我們不能說一切生活都是感人的，都是艺术的源泉。一切生活如果都是感人的，都可以产生强烈感情，那么艺术家所謂选择題材云云，更毫无意义了”。“資产阶级固然认情感为艺术源泉，无产阶级亦未尝不以情感为艺术所决不可少”。

王子野、茹行等人都认为周谷城的艺术“以情感为其源泉”的說法是錯誤的。他們強調社会生活是艺术唯一的源泉。茹行认为“周先生多次強調艺术以情感为源泉，否认社会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他的真正目的无非是要想說明艺术的源泉不在客观世界，而在艺术家的主观世界。”朱光潛认为周谷城的观点是資产阶级的表现主义，“而在艺术的任务就只在表现情感这个基本观点上，则鮑山葵，克罗齐和周先生却完全是一致的。”关于周谷城把“选择題材”等作为艺术源泉是情感的論据，許多人指出这是混淆問題。茹行說，說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决不意味着生活就是艺术。馬克思主义的反映論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論。“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艺术所反映出来的生括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两种提法是毫无矛盾的。馬奇认为，周谷城的論点否认艺术反映人民生活的必要，否认艺术家到火热的斗争中的必要。他进一步指出：“任何經過精巧伪装的脱离以社会生活为艺术的唯一源泉的

理論，都不过是誘劝革命艺术家脱离社会生活，反对艺术家改造世界观；畏惧革命艺术品的产生的骗局”。

三、艺术創作過程的特征

周谷城以为“創作過程應該是由主观到客观的‘斗争’，不應該是主观与客观的‘平行’。創作开始之前作者有强烈的主观要求；創作进行之时，主观与客观有尖銳的冲突对抗；創作成功之后，主观应已被表現为客观了”。他认为，創作活動只能在生活不平靜之时开始，这种不平靜的生活，有三个特点：“一則客观的情况明白显现，与自我相违，即与主观对立起来，阻挠着身体的活动，使不能暢快的前进。二則主观的心理活动，原是与身体的活动融合无間的，現則分別显现，跳出来独立活动。三則生活陷入不稳定，甚至很痛苦的境界中；主客观互相分离，心、身不能統一，統一的活动受着阻挠。”这时候，“独立的心理活动”成了一般所謂思維，要“緩和生理的活动”、“消除当前的障碍”、“恢复心身的統一”，于困境中找出可行之路，这就是理想。“一个理想提出来，只訴諸情感，不付諸实行”，这样的实现“可称之为理想的虚拟的实现”，即艺术的实践。

王子野认为这实际是資产阶级理論家抽象的心理分析法的再版。陆貴山认为周谷城是“把思維的內容片面地限定为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的个人生活，而絕口不談思維內容的社会性和阶级性”。馬奇批评了周谷城所說“使情成体”并不是什么“美的創造的科学过程”，他认为“这不过是为否定

艺术的客观内容的形式主义直至破坏形式的形式主义辩护的理論。”茹行认为周谷城把理想看作个人設法走出困境、追求“心身統一”的道路，是和实用主义观点相近的。他也认为用“使情成体”、“理想虚拟的實現”來說明創作过程是走向主观唯心主义的“自我表現說”。姚文元认为：“在周先生看来，創作过程不是客观的人类社会生活經過思維的矛盾运动而反映到艺术家头脑中来的过程，而是經過主观同客观的猛烈‘斗争’使主观表現为客观的过程。这是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創作論。”

四、艺术中的情与理

周谷城以为“艺术品之发生作用，在于以情感人：一件艺术作品，一方面体现情感，另一方面则动人情感”。使“被感动者全人格受到震动，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况，他說“頗近乎一般所謂直觉”。至于艺术中的情是什么样的情，他认为必須表現“真实情感”，而反对提“阶级情感”。他的理由是：“阶级感情四字太无一定，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仇恨？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感情？这样含糊的名詞在这里不能使用；要使用还須另加說明，倒不如不用”。“斗争并不止于阶级的，还有人对自然的斗争。人对自然斗争所生的情感，不能归入阶级情感内。如农民对天灾所生之感，渔民对海浪所生之感，就不好說是阶级感情。”“真实感情范围大于阶级感情；我們讲艺术理論，当取范围較大者。……个人作品所表现的感情是

具体的，决不是含糊籠統的階級感情四字所能代替”。

許多批評文章中都反对周谷城这样的观点。王子野认为，“艺术作品既要有感情，又要有思想，两者不可缺一”，而“感情总是受理智、思想支配着的”。陆貴山认为“艺术形象是認識和情感的合金”，“艺术的情感因素产生于并服务于对真理的認識”。他問周谷城“片面地夸大情感，把情感說成是艺术中唯一重要的因素，想置理智和思想于何地呢？”朱光潛指出：“由于在艺术中排斥了‘理’，周先生就必然要排除艺术的思想性和認識作用。”他以为这是周谷城的表现主义在情与理关系上必然会有的观点。对于周谷城強調“真实情感”，反对提“階級情感”的观点，許多文章都进行了批評。茹行认为周谷城的观点，“除了把人看作超阶级的抽象的人，把‘范围’扩大到寻求‘共同人性’以外，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朱光潛认为周谷城的观点是超阶级的。他說“問題在于怎样才算‘真实’。在阶级社会中，情感必然带有阶级的烙印”，是按不同阶级情感去表现呢，还是皂白不分，“汇合”之为“情感”（例如爱与恨）取消其阶级内容呢？他反問周谷城这两种哪一种才算“真实”呢？

五、时代精神

周谷城认为艺术創作要有超出模仿的东西，“超出模仿的东西，就一方面說，虽属出于創作；然就另一方面說，却是广泛流行于整个社会的时代精神”。各个时代有不同的思想意識，“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

虽是統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各截然不同。这种种的不同，进入各种艺术作品，即成創作的特征或独創性，或天才的表现。”

許多批評文章中认为这观点是周谷城“真实情感”說的必然結論。茹行认为“在历史上，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統治阶级和被統治阶级的思想意識从来也沒有‘汇合’成一个統一的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无非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內在某一社会中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周谷城的观点“把各个阶级的思想并列混合，否认无产阶级思想的絕對领导地位，否认无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不可調和的斗争。”姚文元认为周谷城“抹杀矛盾双方的 不同性质，否认經過斗争产生的革命轉化，这就是周先生认为，‘不革命，反革命’思想都‘汇合’成时代精神的哲学根据。这在方法論上是一种詭辯。”姚文元还认为“我們常說的文艺要表現今天社会主义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是革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实践中的伟大的精神面貌，就是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的伟大的精神面貌，而不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投降帝国主义的种种精神。”

在七月七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金为民、李云初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問》。这篇文章是支持周谷城、反駁姚文元的。文章中說，历史上“既有先进的革命的时代精神”，也有“腐朽、反动、停滞、落后的时代精神”。他們认为艺术中各阶级、阶层的各种典型人物，都直接体现时代精

神，认为現在写人物要注意“更有普遍常見的、平凡的人之常情”。

六、艺术的社会作用

周谷城认为艺术創作的社会作用“可以勉强分为較大的三項：一曰填補不足，二曰糾正錯誤，三曰發揚优点”。“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以理服人的，而是以情感人的。”“被理說服者，可以参加对自然的斗争或对阶级的斗争，推着历史前进；被情感感动者，更可以参加对自然的斗争或对阶级的斗争，推着历史前进。”“艺术作品，只要是体现了真实情感的，都是可以动人的。就这点說，理想的虛拟的實現，其作用可以是很长远的：……只要它所体现的情感还是人类中可能有的，其感人的作用亦必随着存在，是曰不朽”。

批評周谷城的文章則认为这是不符文艺实际的。馬奇說，現在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統一的一般的艺术，“属于不同阶级的艺术，将發揮不同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周谷城抽象談論理想、艺术作用后說：“对艺术的社会作用，必須作具体的阶级分析”，“如果不放弃超阶级的抽象的議論，不认真貫彻阶级分析的方法”，不論怎样装点門面，也掩盖不住問題的实质。茹行认为“艺术不仅訴諸我們的情感，而且也要訴諸我們的理智”。如果艺术認識只能停留在直觉的阶段上，那么艺术的認識作用和教育作用也就非常可怜了。陆貴山认为，“以普遍人性論为基础的人的共同情感是不存在的，艺术作品的不朽也不是因为它体现了什么人类情感的‘通性’。”王子野

說：“不朽的作品一定有真實的感情，但是有真實感情的作品未必都能不朽”，不能撇開思想內容去評價。應該強調階級感情，而不是抽象的真實感情。

（原載1964年7月18日《人民日報》）

評周谷城先生的矛盾觀

姚文元

不要逃避和掩蓋分歧的實質

讀了周谷城先生的《統一整体与分別反映》（刊于《光明日報》1963年11月7日）一文，頗為詫異。我在《略論時代精神》一文中，着重批評了周先生超階級的“汇合”論，并从正面提出了我对時代精神的看法。周先生的答辯文章只字不提他的“汇合”論，却把討論朝着“統一整体与分別反映”上拉过去，想另外讲一套来修补漏洞。对于我的論点，除了制造出“單向地主思想去找进步的动力”“历史上有过不同階級是不幸的事”这类希奇古怪的“理由”来否定外，提不出任何认真的反駁。这种迴避矛盾，扯東补西，采取“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办法，决不是学术研究的郑重态度。

譬如，原来我和周先生討論的焦点之一是：究竟什么是時代精神？時代精神究竟是不是各階級意識的“汇合”？在这个問題上，我同周谷城先生有着根本的分歧。可是周谷城先生却把“時代精神”偷換成“这个时代的精神”即“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于是就扯开去說：“革命精神之外，

还有非革命的、不革命的、反革命的精神种种”；接着又說：“如果今日中国只有一个阶级的一种精神，革命的对象是什么？沒有对象而革命，是无的放矢”。——不能不說，这种方法，在学术討論中是罕見的。

一个自命为既有“历史唯物論”又有“辯証法”的人，怎么能够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这个时代”的各种精神去偷換“时代精神”的概念呢？連小学生也知道，有些概念不能只从字面的意义去解释，“紙老虎”不能解释成“一只紙做的老虎”，所謂“自由世界”不能解释成“自由的世界”。同样的，“时代精神”也根本不能解释成“这个时代”有几种不同的“精神”。如果这样庸俗地去分析一个概念的涵义，那一切科学的探討都将被全部取消。用庸俗化的方法，虽然可以无中生有地把“否认革命对象”、“今日中国只有一个阶级一种精神”之类希奇古怪的帽子，加到对方头上，但毕竟是絲毫也沒有力量的，它只能暴露自己理論上的空虛。

周谷城先生又认为：我对“創新”的分析与他“不謀而合”。他說，虽然我提出“創新”“独創”有截然不同的阶级内容这点他沒有讲，但我的观点仍同他一样：“不錯，我沒有讲；不过我沒有讲，姚先生多讲点，不是一样的很好嗎！”我参加过多次討論，还从来没有看到用这种奇妙的方法来为自己辩护的例子。我的观点明明与周谷城先生相反：他掩盖阶级矛盾而我揭露阶级矛盾；他超阶级地提出創新、抽象地肯定一切創新，我从阶级观点提出創新，肯定“革命的、进步的創新”而反对“反动的、以腐朽为神奇的創新”。这怎

么会变成与他“不謀而合”呢？我“多讲”了的，明明是周先生所反对或抵触的；怎么能硬說我同周谷城先生观点“一样”？周先生要把我拉进“无差別境界”去，是办不到的。

象这种論証方法，全文有二十几处之多，不再一一列举。既然周先生执意要把討論挑向“統一整体”以及哲学、艺术、历史等各个方面，我們决不迴避。这篇文章就准备結合回答，对周先生的矛盾观作进一步的考察，看看他的一套关于矛盾的理論到底是什么？

周先生笔下的由“汇合”而成的 “統一整体”是怎么一回事

周谷城先生竭力把自己的“汇合”論說成是辯証法的統一，又把他对时代精神的看法說成是合乎对立統一的規律。为了掩盖自己的矛盾調和論，他这次的确說了許多似乎在強調斗争的話。但是，真的不能說成是假的，假的也不能說成是真的，要用“汇合”論来冒充馬克思主义辯証法，毕竟是办不到的。

什么是辯証法的对立統一？《矛盾論》里說得很清楚：“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統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轉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8頁）这也就是辯証法所指的同一或統一的全部意义。

什么是周先生的“汇合”論？他的文章向我們指出：这就是各个阶级各种相互对立的思想“汇合”为一个“全体”。

“分別反映为部分，統一的整体为全体。全体成于复杂众多的諸部分，这些部分彼此是对立斗争的；因此这样的全体，不是什么超阶级的空洞之物。反过來說，部分在整体内对立斗争，无时或忽，因此只能分別反映，不能彼此代替。”

周先生以为这样一变，就立刻可以把他的那种“汇合”論，变成辯証法了。然而，只要把上面两段話略为对照一下，立刻可以看出周先生的“統一整体”或“全体”，同辯証法中由对立统一构成的統一体截然不同。

这种不同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馬克思主义辯証法所說的“統一体”，是指矛盾着的双方既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又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互为存在的前提，因此构成有規律地发展着的統一体。所以辯証法要求分析矛盾双方的相互关系，看出这个統一体及其矛盾双方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以便充分調动一切革命的、积极的因素，推动事物的革命轉化。但周谷城先生所說的“統一整体”，却根本不是指的矛盾双方的这种客观的辯証关系，是把各色各样“不革命的、非革命的、反革命的”思想統統不加区别地“汇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把这一时代各种五花八門的思想“汇合”成一个抽象的“时代精神”，这不是把各种不同思想杂凑成一鍋，調和成一个大杂烩，又是什么呢？这种“整体”，貨真价实地是“超阶级的空洞之物”，同对立统一規律所說的“統一体”根本是两回事。

第二，周谷城先生把矛盾諸方面的相互关系，說成是“全体”和“众多的諸部分”的数量关系，即諸部分加起来

等于全体的关系。他气势汹汹地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統一整体，然而截至目前为止，它不仅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意識，而且事实上还有不同阶级存在，不同种族存在，不同語言存在。”当然，誰不知道整体可以分为諸部分，諸部分可以合为整体呢？这只要有起碼的形式邏輯知識就解决了。这怎么能够代替辯証法的对立統一呢？即使分析部分和整体这种統一体的辯証关系，也要分析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轉化，要分析其中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而不是“包括”一下那样不花气力。

在周先生看来，只要說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多少“种族”、多少阶级的“汇合”，就能證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辯証的“統一整体”了，然而这恰恰暴露了他完全抛弃了辯証法。辯証法的对立統一，不是仅指一个整体內包含多少部分，这只要簡單的数学上的加減法就够了；人們都知道，辯証法的对立統一，是要揭露对象本身固有的内部矛盾。任何一个統一物不仅可以分为許多部分，而且还可能并有必要分为两个部分。列宁指出：“統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認識……是辯証法的实质（是辯証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主要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是它的最主要的特点或特征）。”（《談談辯証法問題》，《列寧全集》第38卷，第407頁）中华人民共和国确是“統一整体”，但把各个“不同阶级”統統“汇合”起来湊成的“統一整体”，只是靜止的、不变的，形而上学的“統一整体”。辯証法的对立統一要求我們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阶级之間，存在多种不同性

质的矛盾，但多种矛盾之中，主要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影响着其他种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可以而且必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将这个统一体一分为二，以无产阶级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革命人民为一方（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以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为一方，从阶级关系上研究统一体中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依存、斗争和转化。民族亦然，民族关系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阶级关系的一个侧面，不同的民族构成民族关系上的统一体。由于看到了这个侧面，我们不但可以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各民族的内部矛盾，而且可以用以分析民族关系在整个阶级关系中的地位，分析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政策中，规定着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两种倾向，就反映着民族关系这个统一体中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这才符合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如果象周先生那样把“统一整体”只看作各个民族加起来，那一切民族政策都可取消。明明是只有数量变化的形而上学的“统一整体”，怎么能冒充成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呢？顺便提一下，周先生用“种族”来代替民族，这也是错误的。

第三，更重要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不仅承认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而且强调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矛盾论》说：承认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还不够”，“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6页）

承认轉化，就是承认革命，承认飞跃，承认质变，承认新生事物必然代替腐朽事物，承认革命阶级一定要战胜反动阶级。《矛盾論》中分析了大量的材料，証明了这样一个真理：“新陈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經過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轉化为他事物，就是新陈代謝的过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則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頁）經過对立面的斗争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推动历史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向前不断发展，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过程。而一切腐朽沒落的力量，一切形而上学者，都是諱言革命的轉化，否定經過斗争使新生事物取得胜利而达到质的飞跃。但是周先生的“統一整体”論，恰恰取消了这个“更重要的”关系，他把“統一整体”中各个阶级及其阶级意識調和起来，象迴避触着痛处一样，矢口不談矛盾的轉化，矢口不談斗争是为了达成革命的轉化，更矢口不讲新生力量和腐朽力量的区别。就是他为了証明自己是“对立統一”的維护者而大讲特讲“斗争”的地方，也只是讲对立面是“互相联系着，互相依靠着，互相斗争着，互相制約着”，“无时或忽”，而絕口不提轉化、飞跃、质变。这样，周先生就把对立統一規律的革命灵魂抽掉了。

这是偶然的嗎？不，这是周先生矛盾調和論必然要导致的結論。从本质上說，周先生是滿心希望有一种“无差別境